



世纪论兵

■ 姚有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世纪论兵

姚有志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纪论兵/姚有志著.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2. 4

ISBN 7-5033-1536-9

I. 世… II. 姚… III. 论文-论文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3125 号

书 名: 世纪论兵

作 者: 姚有志

责任编辑: 殷 实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8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E-mail: jfwycbs @ public. bta. net. 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厂印刷

开 本: A5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12.125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536-9/I·1230

定 价: 25.00 元



作者近影

责任编辑：殷 实

责任校对：吴 汇

装帧设计：
十 畝 装 帧

目 录

导 言 迎接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1
第一章 军事传统论	4
一、中国传统地缘观的演变及特点	4
二、古长城与中原王朝的防务特征	21
三、中国古代边防的基本特征	29
四、古代中西军事传统之比较	40
第二章 战略本质论	60
一、战略的泛化、守恒与发展	60
二、我军战略转变的成功经验	74
三、新中国 50 年的军事战略指导	79
四、20 世纪战争和战略理论的特色	93
五、战争形态的变化与战略理论的发展	109
六、战略思维规律与方法新探	114
第三章 安国兴邦论	125
一、强兵是安国兴邦的永恒主题	125
二、人民军队的实践与中华民族的振兴	140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防建设	151
四、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热潮的时代蕴涵	162

五、和平建设时期国防建设的基本经验·····	169
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捍卫国家根本利益·····	177
七、勿忘国耻 固本兴邦·····	188
第四章 经典指南论 ·····	195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科学价值·····	195
二、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	202
三、红军长征的战略指导·····	209
四、从陕北三战三捷看把握战机的艺术·····	216
五、坚持和发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221
六、邓小平战略思想的主要特色·····	232
七、履行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使命·····	243
八、军事改革与社会变革·····	254
九、坚决贯彻科技强军战略·····	271
第五章 战争形势论 ·····	282
一、21世纪美国的战略走向·····	282
二、新千年开启之际的战争思考·····	289
三、世界多极格局与战争根源分析·····	293
四、日本在“第三次远航”中的军事动向·····	303
五、核武器是人类安全的定时炸弹·····	307
六、20世纪战争回顾与21世纪安全形势展望·····	314
附 录 环球军事采风 ·····	330
一、浮光掠影看美军·····	330
二、欧洲观景·····	352
三、出访美军十日谈·····	359
后 记 ·····	383

导 言 迎接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

人类怀着美好的憧憬，在欢歌笑语中挥手告别了 20 世纪，迎来了 21 世纪，跨入千年等一回的第三个千年纪元。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一个世纪。人类在这个百年中所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以往几十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自 20 世纪初叶完成大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又步入核时代和高技术时代。各种政治势力的相互撞击，各种思想流派的相互激荡，以及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势不可挡，使以往松散的世界变成了真正的地球村。

同时，20 世纪又是一个战争登峰造极的世纪。从 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拉开 20 世纪的战争序幕，到 1999 年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侵略南斯拉夫战争包括轰炸我驻南使馆，战争这个怪物一直横行于这个世纪。20 世纪前 50 年，爆发了人类历史上迄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后 50 年又在核战争的阴影下爆发了若干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人类在不断以自己创造的文明成果做武器，破坏和摧残着人类文明。20 世纪就是在这种文明与野蛮、战争与和平的矛盾和斗争中，实现了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跃进。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20 世纪也是极不平凡的世纪。这是中华民族从觉醒、崛起，到初步振兴的世纪。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前赴后继，挽救民族危亡，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崛起，建立了新中国。20 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起步，在曲折中前进，在困难

中创造了辉煌。

从千年纪元的角度看，从 1001 年到 2000 年的第二个千年纪元，是人类历史上多姿多彩，社会文明加速发展的一千年。在这个千年里，人类社会实现了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次飞跃，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也昂首挺进历史大舞台。在科学技术进步的驱动下，第二个千年纪元的战争形态也经历了冷兵器、热兵器、机械化、核技术到高技术的五大转变。

中国在第二个千年经历了诸多的曲折与挫折。正是在这个千年，中国积贫积弱，丧失了世界领先的地位。第二个千年开启的北宋年间，是中国告别大唐鼎盛时期而处于分裂和走向衰弱的时期，之后又经历思想文化较为落后的北方游牧部族入主中原的元代，以及比以往朝代更封闭和保守的明、清两个封建王朝。当中国在封建隧道中步履蹒跚之时，西方却乘着文艺复兴的劲风走进了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撞击轰击下被动地走入近代的。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屈辱将使每一个有血气的中国人刻骨铭心。值得庆幸的是，在告别第二个千年纪元之时，中国已经觉醒、崛起，并实现了初步的振兴，坚定地迈出了走向全面振兴的步伐。

回顾过去，我们感慨万千；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和希望。21 世纪必将比 20 世纪更辉煌，第三个千年必将比第二个千年更灿烂，这是毫无疑义的。同时又不能不看到，20 世纪的矛盾、困难、问题和隐患将被带入 21 世纪，特别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横行仍将给国际安全带来诸多不测因素，遏制中国的逆流还会不时卷来。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有一首歌唱道：“赶上了盛世我们享太平。”用自己的今天同昔日相比，称当今之世为“盛世”还可以成立，但呼吁人们“享太平”则大谬矣。盛世是奋斗和战斗得来的，不奋斗和战斗哪来盛世？安不忘危，乐不忘忧。即使是盛世也存在形形色色的危机。当然，一句麻痹性歌词不值得大惊小怪。在已经觉醒的亿万民众面前，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振兴的脚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可以坚信，中国在 21 世纪必将实现全面振兴，中国在第

三个千年纪元必将重显汉、唐雄风，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章 军事传统论

一、中国传统地缘观的演变及特点

人类是以陆地为主要活动舞台的高级动物。因此，以陆地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地缘环境，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基本外部条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历史唯物主义不承认地缘环境对社会进步的决定作用，但承认地缘环境对人类活动有着多方面的影响。一定的地缘环境不仅制约着人类的分布、迁徙、经济形态、政治结构、文化特征及民众心理，而且对战争的起因、性质以及战争思想亦有深刻的影响。

中国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已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50 多个世纪。曾经与中国并起并称的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如巴比伦、埃及和印度，都曾经在历史的沧桑剧变中、在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多次经历过亡国断史的厄运，有的甚至永远地消逝在时间隧道中。然而中国虽有近代落后挨打的屈辱与教训，但总体上却以“万里长城永不倒”的顽强生命力，在沙场鏖战和改朝换代中保持了历史的一贯性，成为世界上惟一个不曾中断历史进程的文明古国。这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处的独特的地缘环境以及利用和驾驭这一地缘环境的地缘观。

(一)

中国地处亚洲大陆或者说是东半球的中心地带。伟大的中华文明即诞生于这一中心地带的核心地区——黄河流域。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以黄河流域的中原腹地为轴心，逐步向四周渗透和辐射，形成和营造了幅员辽阔、条件完备的生存圈。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华民族以地处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前进出发地，建立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政权，并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更替中，奠定了行政区划的总格局。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活动范围主要限于黄河和长江流域，但是到了周代，政治势力就已经扩展到黑龙江和珠江流域。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肃慎人，早在公元前 11 世纪就臣服于西周王朝，定期向周王室纳贡。到了秦汉大一统时代，中原王朝的势力范围在北至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诸岛、东到大海及相关岛屿，西至巴尔喀什湖北岸相对固定下来，最早奠定了大中国的基本版图。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间，稳定的中原地区与辽阔的周边地区紧密相连，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延续和普及着中华文明。

与人类历史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的发源地相比，中华文明圈既有与其他古文明发源地的共同特点，又有自己的鲜明特征。就共同点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均发源于江河流域。古巴比伦崛起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通称“两河”）流域；古埃及称雄于尼罗河下游，古印度诞生于印度河暨恒河之地。另一个共同点是都属于农业文明。农业的发明，使原始人类实现了由飘忽不定的渔猎生活到定居生活的跨越，并为人类跨入文明社会奠定了物质基础。在“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作用下，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发源地，基本上处在同一温度带，即北纬 20° — 40° 之间。再加上江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适合农作物生长，从而使这些地区最早形成了定居性农业地区，成为人类最早开化的几个中心带。

中华文明区与其他古文明区的不同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不同是，中华文明区天地广阔，发展余地大；其他古文明发源地发展的空间较小。中华文明从黄河流域发源，向南拓展到长江和珠江流域，向北延伸到辽河和黑龙江流域，气候带从温带跨到热带和寒带，同时在东、西两向，也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相比之下，其他几个古文明发源地，发展空间则要小得多。其中“两河”流域地幅狭小，发展农业潜力不大；古埃及所在的尼罗河下游之地，形势与“两河”流域相近似；古印度的生存空间比上述两地要大一些，但周边范围要比中华文明区小得多；后起的古希腊地处半岛山区，活动范围更为有限。第二个不同是，中华文明区相对独立和封闭，各种交流主要限于内部；其他古文明区在地缘上则比较接近，外部交流比较频繁。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中华文明圈存在着比较完善的自然保护机制。东部和东南部由太平洋环抱，茫茫沧海，形成了天然疆界；西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分别由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天山山脉、阿尔泰山山脉以及唐努乌拉山脉阻隔，巍巍天险，形成了难以逾越的屏障；辽阔的北部为高寒极地，人迹罕至。这一特殊的自然环境，为中华民族提供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世界上其他几个文明古国，大部分集中在地中海沿岸地区，在地缘环境上无大的阻隔，而且还处在人类迁徙和争雄的交通要道上，缺乏独立发展和完善的内部条件。第三个不同是，中华文明区的重心稳定，而其他古文明区则经常处在各领风骚、此起彼伏的动荡状态。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基本固定在黄河暨长江流域。其间无论是统一时期还是分裂时期，是汉族统治者建立的中原王朝，还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入主中原，都未能改变这一格局。其他的古文明区则缺乏这样一个稳定的中心，其文明的传播也不是像中国那样从中心地带向四周传播，而多是平行交流，互相渗透和影响，没有形成统一的、主宰性的和连续不断的文明力量。

存在决定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定的地缘环境决定了一定的地缘观。中华民族的传统地缘观，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地缘环境作用

下，逐步酝酿而形成的。

(二)

中华民族的地缘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服事”观就是其中出现较早，影响深远的重要思想。

“服事”，即服从、治理之义。它反映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地区的义务和责任关系，反映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联系。

最早记载“服事”观的是周代的《尚书》，其中在传说是大禹的著作《禹贡》篇中就有这样的记述：“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这是关于著名的“五服”说最早的历史记载。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是五个不同的地缘层次。甸服是指以都城为圆心的五百里半径范围，其他以此类推，由内及外，每服五百里。各服根据中央的规定和要求，维护整体的利益和核心的权威。

除《尚书》的“五服”说之外，还有《周礼》的“九服”说。“九服”说同样认为，方圆千里的中央地带为王室的直接领地，然后以此为轴心，每向外推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

当然，不论是“五服”说还是“九服”说，都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真实。因为从周代以前历史上各个朝代来看，没有明确划分“服”的范围，更没有划定这一“服”与那一“服”的界线，在具体治理上不过是直接管辖和羁縻（自治）两种，没有区分那么多层次。但是，“服事”观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思想，既来自于实践，又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实践。“服事”观明确强调了中华民族生存圈内一个核心的存在，具体规范了核心地区与外延地区的关系，初步建构了由核心控制外延的整体结构，从而为古代中国治理政策的形成和政治模式的定型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尚书》、《周礼》记载的“服事”观，后来被纳入儒家经典，成

为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以后的统治者所沿袭。自秦汉始，历代中原王朝以“服事”观为指导，逐步在中华民族的生存圈内建立起完善的“服事”治理系统。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中原地区推行战国时期形成的郡县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对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保留王、长的称号，称其为邦君，给予较优厚的待遇，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以羁縻为主的制度。汉基本上因袭秦制，并进一步扩大了羁縻的范围。汉的版图北部抵达贝加尔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西部包括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东部至鄂霍次克海及其以西的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东南部至东海、南海之滨并深入到南海诸岛及中南半岛地区；西南至云南和青藏高原。汉的统一，把千余年来中原地区与四邻之间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

秦汉以后的其他大一统王朝时期，如唐、元、清，均在中原地区外延的辽阔地域设置了大量府州或羁縻性军政机构，实实在在地将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集权的统治体系之中，使“服事”观得到进一步贯彻。据史书记载，唐代设置的稳定性羁縻府州，多达 856 个，比直接管辖的府州多一倍半。元、明、清时期，根据外延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日益趋同，许多羁縻性府州升格为直接管辖的府州。元代首次对地缘环境特殊、自治性较强的西藏地区实行了有效管辖，使中国的基本版图趋向稳定。清朝康、雍、乾年间，通过平三藩，定台湾，对喀尔喀（蒙古）编盟设旗，统一天山南北，改革西藏行政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重大举措，加强了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使中国的版图在北至恰克图，南至南沙群岛，西至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库页岛的广袤空间稳定下来，陆地面积达 1300 多万平方公里。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统一与分裂始终在周期性的交替出现。统一时期，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中原地区，既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全国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因此，统一时期的“服事”观就是围绕一个中心贯彻的。然而在分裂时期，群雄并起，割据

称霸，在中华民族的版图上出现了多中心现象。多中心打破了“内环”与“外延”的传统格局，在“内环”与“外延”地区都有王朝政权存在，从而使全国服从一个中心为基础的“服事”观受到挑战。但是历史事实表明，一个时期的分裂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有助于新的统一。统一时期，“外延”地区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境地，与内地各方面的联系较为松散，经济、文化发展也相对滞后。分裂时期，由于割据政权各自加强对自身控制范围的治理，加强了传统格局时期“外延”地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一个中心时期政治链条末端地区的松散现象，从而为新的大兼并和大统一准备了更好的条件。例如，唐之后短短的半个世纪中，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政权，即五代，与之并立的有南方九国及北方的北汉（即十国）和契丹、大理、回鹘、吐蕃等等一些割据政权，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原后，周边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也渐成气候，出现了宋与辽、西夏、大理、高昌、黑汗以及稍后的金并立对峙的局面。当时除宋占据中原外，辽的疆域东至鄂霍次克海，西至阿尔泰山以西沙漠地区，北至外兴安岭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和勒拿河上游地区，南及今内蒙古和山西、河北北部及朝鲜半岛北部，面积相当于北宋的两倍。另外，高昌控制了天山南北；黑汗控制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西夏占有今宁夏，甘肃中、西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及蒙古国南部等地；大理领有今云南全部及贵州、四川和越南、缅甸一部。这些少数民族政权，对统一时期松散的边境地区进行了有效治理，使社会结构更加紧密和完善，为新的统一准备了条件。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南下，在中原逐鹿中力拔头筹。较长时期的分裂分治成为“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忽必烈单凭赫赫武功就能轻而易举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

总之，“服事”观肯定了政治核心的存在及其社会历史作用，肯定了由内到外、由近及远、因俗而治、逐层设政的统治模式，既是中央集权政权模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理论根基，又对中国传统的军事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上，与“服事”观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地缘观则是“华夷”观。华，又称华夏，最早是指上古时期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融合后形成的部落联盟。由原始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后，华夏指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商、周之后，特别是秦、汉大一统之后，华夏是历代中原王朝的自称。到了近代，华夏又泛指中华民族。

夷，又称四夷，古时是华夏集团对周围少数民族的统称，近代以后是指对中国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的外部势力。

“华夷”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上古时期，中华大地上就存在众多的部落联盟。其中除了黄河流域的炎黄部落外，在今山东一带有东夷，长江流域有三苗，山西和河北的北部有北狄，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有西戎。阶级社会建立之后，“四夷”大部与华夏融合，少数则向周边退居。随着华夏直接控制范围的扩大，又形成了新的“四夷”。根据考古资料，夏王朝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在今晋南和豫西地区。后来先后经历了夷夏纷争时期、诸夷归附时期和夏夷相安时期，华夏地域有了很大扩展。

大约在公元前16世纪，居住在今河北南部的黄帝后裔的一支强盛起来，并乘夏王朝的衰败灭夏立国，是为商朝。商代的疆域，北部和东部承夏代，西部包括今陕西大部和甘肃南部，南部到达江汉、湘、赣流域。商代的“四夷”，除山东半岛尚有少数东夷人外，“东夷”基本上失去了地缘上的意义，从而变成了华夏的一部分；长江以南广大荒服之地也逐渐归附，在政治上构不成对商王朝的威胁；北狄和西戎却日益形成气候，成为商王朝的心腹之患。据史书载，中原西部的今陕、甘、宁及青海一带，有昆仑、狗国、鬼亲、枳己、贯胸、雕题、离丘等等西戎诸国，北部在今陕西、山西和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有空同、大夏、莎车、姑他、匈奴、楼烦、月氏、东胡、孤竹

等等诸部。这既是商王朝主要的“服事”地区，又是对商王朝的安全威胁最大的两个方向。

商朝末年，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周被视为“夷狄之邦”。然而周人却在其首领姬发及其辅臣姜子牙的率领下，提兵东进，于公元前1066年灭商建国，史称周朝。周朝的建立，不仅使所谓的“夷狄”成为中原地区的统治者，而且向四周大大拓展了直接控制地域。为了加强对周边四夷的统治，周王朝推行封土建侯制度，把姬姜贵族子弟及功臣分封到四夷地区建立诸侯国或控制夷狄之邦，以达到“以藩屏周”的目的。至东周时期，周王室衰落，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的诸侯国坐大，出现了长达数百年的“五霸”、“七雄”争霸称雄时期。至秦始皇剪灭六国，建立大一统王朝后，“华夷”实现了更大范围的融合。由秦及汉，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形成与发展，我国封建时期的“华夷”关系、中原王朝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开始明朗化，并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原王朝处理与少数民族地区关系的基本框架。

把中原地区称之为“华”，把中原地区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称之为“夷”，既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又反映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与矛盾。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华夷”始终存在于一个统一体中，二者相比较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如果一方不存在，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在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二者又存在着区别和对立。“华”，多指汉族活动区；“夷”，多指少数民族活动区。“华”，多指以农业经济为主导的社区；“夷”，多指以游牧、渔猎经济为主导的社区。“华”多指中原王朝政权；“夷”，多指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自治政权之间发生的多次冲突和战争，就是古代中国“华夷”矛盾的最高表现形式。

在古代中国，“华夷”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互相转化，也可以合二为一。随着华夏同化地域的扩大，使一些“夷”与华夏融为一体。华夏民族向外部的迁徙，又使一些华夏人